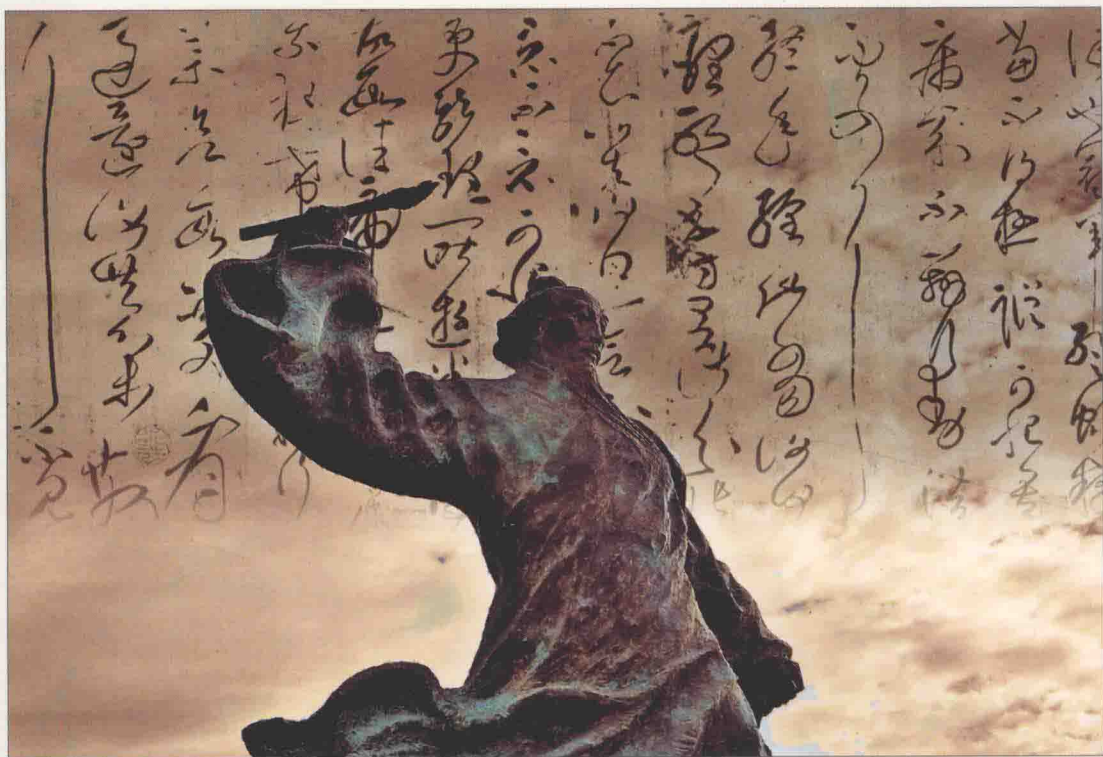




华夏文明之源

绚丽甘肃
HAILIN GANSU

河陇人物



ZHANG ZHI

张 芝

刘云鹏 /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华夏文明之源

河 陇 人 物



ZHANGZHI

张 芝

刘云鹏 /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芝 / 刘云鹏著.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4. 12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23-3313-1

I. ①张… II. ①刘… III. ①张芝(? ~192) — 人
物研究 ②张芝(? ~192) — 书法评论 IV. ①K825.72
②J292.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476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白 鑫
美术编辑: 马吉庆

张 芝

刘云鹏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056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05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3-3313-1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连 辑

副 主 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 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 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 划：马永强 王正茂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教名山”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边关

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座”。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张芝的生平
- 008 张芝与今草
- 034 张芝的人品学养及其艺术成就
- 056 “匆匆不暇草书”的含义
- 066 张芝对历代草书创作的影响
- 102 北“墨池”、南“兰亭”
- 122 参考文献

张芝的生平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两位圣人：一位是“书圣”王羲之，另一位是“草圣”张芝（图1-1）。有关王羲之的记述，在古代文献中很多。而关于张芝的原始记载却很少，仅在《后汉书·张奂传》中有“（张奂）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25个字和卫恒《四体书势》中的63个字，以后记述都是以这些文字为依据的发挥



| 图1-1 张芝像

和演绎。这给后人研究张芝及其书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从这不足百字的记载，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张芝的生平、籍贯、生长环境做一梳理。

一、生卒年月

根据赵壹与皇甫规，皇甫规与张奂（张芝之父）之间交往，只能推测出张芝与赵壹同时代的人。张芝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

中平三年（192年）。对于张芝更为准确的生卒时间,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无法再进行更详细的考证了。

二、籍贯

学界对张芝的籍贯历来也有争议,记述各不相同。有的依据其父张奂的籍贯记载为“敦煌酒泉人”,如《后汉书·张奂传》和《敦煌志》皆为“敦煌酒泉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汉纪》“永康元年(167年)十月”条,“张奂”名下注为“敦煌酒泉人”;《辞海》(第六版)“张芝”条为“(约192年),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瓜州东)人”。也有记载为“酒泉人”,如《辞海》(1948年版)中“张芝,东汉酒泉人”;《辞源》(1943年版)中“张芝,后汉书家,酒泉人”;商承祚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中张芝籍贯注为“甘肃酒泉”。有些记载为“敦煌酒泉人”,如《辞海》(1979年版)中“张芝(约192年),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商务印书馆《辞源》(1980年修订版)中“张芝(约192年),东汉敦煌酒泉人”;范初庵、李志贤编辑的《书法小词典》中张芝条为“东汉敦煌酒泉(今属甘肃省)人”。也有人说其是“弘农人”,如南朝宋代人羊欣在《古来能书名人录》中为说“弘农张芝”。

其实要弄清楚张芝的籍贯这个问题,需要从酒泉、敦煌和渊泉县行政设置和演变中去分析。

《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书·地理志》则说:“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

四年开。”“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虽然同一书中记载的四郡建立时间有差异，但是敦煌郡设置最晚，是从酒泉郡分出来的，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考证：“按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酒泉、武威，而后有张掖、敦煌。”《后汉书·郡国志》卷三十条注，敦煌郡下属“六城”，分别为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敦煌郡的这种设置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东汉。

根据《后汉书·张奂传》李贤注：“渊泉，县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瓜州晋昌县东北也。”“瓜州”之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唐武德五年设置瓜州县，县治所在晋昌（今甘肃瓜州东南），明洪武五年废瓜州县设置。康熙帝在安西布隆吉大败葛尔丹部，瓜州始称“安西”，取义为“安定西域”之意。清雍正元年设置安西直隶厅，后改为安西府、安西直隶州，至民国二年（1913年），安西直隶州改为安西县，此县名一直延用至2006年初，2006年2月更名为瓜州县。所以，汉时渊泉县所管辖的区域与今天瓜州县辖区基本一致。

再看酒泉与瓜州县的关系。1949年酒泉解放，置酒泉专区。1959年，酒泉、金塔两县合并建立酒泉市（地级），1961撤销地级市改为县级市。2002年设置酒泉市，所属1区2市4县，分别为肃州区、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张芝的籍贯为“敦煌渊泉（今酒泉市瓜州县）”的表述最为准确。

至于弘农一说，我们只要看看《后汉书·张奂传》就一目了然。

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等胁同种复抄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由此可以看出，张芝随父张奂迁居到弘农很晚，而且张芝后来还是回到了敦煌，所以说张芝为“弘农人”并不准确。

三、张芝的生长环境

张芝的祖父张惇，曾任汉阳郡太守。张芝的父亲张奂少时很有才学，志向高远。《后汉书·张奂传》云：“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张奂师从太尉朱瑗学习《欧阳尚书》，他认为牟长所著的《尚书章句》浮词繁多，于是把原书45万余字删减为9万字，在大将军梁冀幕府任职时，他把删节本《章句》献给桓帝，得到了桓帝的赏识。张奂因此被调到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东观任职，由此可见其才学和胆识；后又举贤良，对策为第一，被任为议郎。桓帝康寿元年（155年），张奂从议郎调任安定属国都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朝廷调张奂担任使匈奴中郎将，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匈奴事务。之后张奂因梁冀事件，被免官禁锢。经皇甫规先后七次向朝廷荐举，四年后朝廷任命他为武威郡太守。张奂在武威期间很有政绩，百姓生为立祠，以示爱戴。由于张奂政绩卓著，延熹六年（163年），朝廷调他担任度辽将军。延熹九年（166年）春，又调张奂担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掌管粮食、货币等国家经济。